

日本资产泡沫危机：失去的二十年

□ 唐军旗 贾雪梅

20 世纪 80—90 年代，日本经历了资产泡沫快速膨胀与急剧破裂的过程，重创了日本经济。其后日本经济低速增长或近乎停滞，经历了“失去的二十年”。这一危机被称为“日本资产泡沫危机”。

（一）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后的近 20 年，日本经济高速增长。1968 年，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第一次石油危机后，日本通过产业结构高级化和经营合理化对企业进行转型，所以在第二次石油危机中，日本受到的影响较小。但是，石油危机对高油耗的美国影响较大，导致出口受阻。日本的经常项目顺差从 1979 年的 18 亿美元猛增到 1985 年前三季度的 552 亿美元。1984—1985 年，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约占其全部贸易逆差的 38%。随着日美贸易摩擦日趋激烈，巨大的贸易顺差使日元面临较大的升值压力。1985 年 9 月，美、日、德、法、英五国签订了著名的《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大幅升值。协议公布的第二天，日元从 1 美元兑换 235 日元上升至 215 日元，到 1995 年 4 月 19 日上升至 1 美元兑换 79 日元的高点，日元的升值预期吸引大量资金进入股市和房地产市场，股市和土地价格同步猛涨，资产价格出现暴涨。1985—1989 年，日均平均股价上涨了 2 倍，股票资产增加了 2.7 倍，上市股价总额增加了 3.2 倍，股票平均价格增加了 2.7 倍。1986—1990 年，东京、大阪等六大城市地价的价格指数平均上涨了 3 倍以上。按当时的不动产价格计算，卖掉东京就能买下整个美国，卖掉日本皇城就能买下整个加利福尼亚。1989 年，日本富豪榜前 100 名中，有 63 名靠土地致富，27 人靠持股致富。此外，为应对日元升值带来的经济衰退征兆，日本央行在 1986 年四次把基准利率从 5% 下调到 3%，并且在 1987 年 2 月再次下调 0.5%，达到当时的历史低点 2.5%，一直维持到 1989 年 5 月，低利率的长期持续使货币供应量大幅增加，使日本出现了所谓的“过剩流动性”，同时，为缓和《广场协议》的不利影响，政府不断增发货币，日本银行不断购入美元，加剧了资产泡沫化。

1989 年 12 月，三重野康出任日本银行总裁，他主张加息，并明令禁止房地产贷款占贷款总额的比率增长。央行贴现率从 1989 年 5 月 31 日的 2.5% 快速上升至 1990 年 8 月 30 日的 6%。日本政府还开征“地价税”，土地转让税从 20%—25% 上升至 30%。1990 年 3 月，日本大藏省发布控制土地金融的政策，这一人为急刹车让泡沫经济加速下滑，并导致支撑日本经济核心的长期信用体系陷入崩溃，股市持续下跌，证券公司、银行、企业出现巨额亏损，针对房地产市场的信贷收紧和停贷甚至贷款催收，加速了地产企业资金运转困难，大量地产被抛售，房价急速下跌，最终导致经济危机。

（二）

日本资产泡沫危机对日本经济的影响相当严重。资产泡沫破灭后，日本货币政策收缩，加上境外投机资金迅速撤退，股市和房市加速崩溃。日经 225 指数从 38915 点断崖式下跌，到 1990 年底已跌至 14309 点，1998 年 10 月下降至 12787 点。房价从 1991 年开始下滑，到 1994 年，东京、大阪等地的房价跌了一半以上。此外，日本很多企业破产倒闭。1990—1997 年，每年的破产企业数均超过 1.4 万家。银行大量坏账无法收回，金融公司的不良资产总额高达 13 万亿日元。除此之外，大批金融机构倒闭。1994—1995 年，东京协和信用社、安全信用社、宇宙信用社相继倒闭，其中宇宙信用社是日本最大的信贷联盟信用合作社；1995 年 8 月兵库银行倒闭，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倒闭的第一家商业银行，打破了“银行不会破产”的神话；1997 年日本四大券商之一的山一证券破产。

资产泡沫崩溃后，日本从此步入“失去的二十年”经济萧条期。根据日本内阁府 2005 年度《经济财政白皮书》数据显示，日本 1970—1980 年十年 GDP 年均增长为 4.6%，1980—1990 年十年年均增长为 4%，而 1990—2000 年十年年均增长仅为 1.6%，其中 1992—2002 年期间，有 2 年日本 GDP 的增长率约为 1%，有 5 年远远低于 1%，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1997

年 GDP 增速再次回落，1998 年出现负增长，为 -1.1%。日本经济从此陷入长期疲软衰退期。

（三）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日本先后经历了资产泡沫的形成、膨胀和破灭，导致了“通货紧缩—经济衰退”螺旋，为其他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了深刻启示。

加快构建优势产业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日本进行全面管制，90 年代以前日本经历重工业、重化工业、“知识密集型”、“创造性知识密集型”四次产业结构调整，具有严重依赖美国和典型的技术“移植”特征。吸取日本泡沫危机的教训，国家必须拥有独立完善的产业体系，警惕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思想带来无序扩张和产能过剩，完善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实施国家投入、国家主导特征的优势产业发展政策，明确国家重点发展产业，设立产业发展基金，制定创新产业的财税、融资支持性政策，淘汰高能耗、高污染产业以及过剩产能，促使资源向优势产业、新兴产业集中。吸取日本半导体产业从全球领先到没落的经验教训，加强重点优势产业的技术研发攻关与创新，建立前沿技术、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实现关键零部件国产化，攻坚“卡脖子”技术难题。

牢牢把握汇率选择的主动权。二战后日本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出口贸易，《广场协议》签订后日本失去了汇率调整自主权，加剧了资产泡沫。汇率对国家国际贸易至关重要，应根据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目标、经济发展阶段、国际贸易情况进行有管理的浮动。对于制造业和出口贸易占比较大的国家，要适当降低汇率，保持合理



以人文交流推动“一带一路”发展

□ 郭永真

今年是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10 周年。10 年来，中国大力弘扬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以互联互通为主线，促进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实现各国共同发展繁荣。2013 年 10 月，习近平主席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强调，为“巩固和扩大我国同周边国家关系长远发展的社会和民意基础”，“要全方位推进人文交流”。人文交流作为不同国家、地区和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际关系发展的桥梁和纽带，在传播各国文化、展示国家形象、建设国家软实力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以人文交流合作推动“一带一路”发展，意义重大。

（一）

人文交流，一般包含人员交流、思想交流和文化交流，其目的是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认识与了解，从而塑造区域文化认同、价值认同，达成区域政治合法性的支持。2017 年 7 月审议通过的《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外人文交流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中外人文交流是党和国家对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夯实中外关系社会民意基础、提高我国对外开放水平的重要途径。人文交流被提高到一个新的战略高度，和政治互信、经贸合作一起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国关系稳定发展的三个重要方面。

“一带一路”人文交流有其自身特点，首先表现为交流主体的多元化。诸多主体交流的目的通过传播自身的文化理念、行为方式、思想观念、技术等促进不同国家人民彼此的了解和各种活动的支持。这种自发组织的人文交流，是推动政府层面深层次全面交流的基石。其次表现为交流方式的多样性。灵活多样的交流方式推动不同国家人民间的人文交流，实现有国别无隔阂、互相理解的最优状态，以彼此国家人民自发形成有利于交往国的舆论氛围，给“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间进一步合作伙伴关系奠定民意基础。最后表现为交流效果稳固持久。促进人文交流不仅能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民众创造沟

通、对话、交流契机，还能增加“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人民互相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风俗、历史、地理情况的机会，增进“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民众之间的友情。

“一带一路”倡议始终传承古代丝绸之路精神，顺应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潮流，彰显人类社会的共同理想和美好追求，将共建国家的文化串联起来，同时也为人文交流提供了重要平台。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共建国家人文交流取得较大成效，如与共建国家互换交流生、建立智库研讨平台、开启旅游合作年、举办文化年等等；人文交流的多方位深层次开展，促使共建国家不断建立新的合作机制，经贸合作额持续上涨，彼此间信任度和理解度提高。“一带一路”倡议的建设内容以“五通”为主，即积极构建政府层面的政策沟通，共同建设连接亚欧非大陆通道的基础设施联通，贸易往来频繁的畅通，资金链的融通，人文交流推动的民心相通。“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人文交流得到大力发展，由原先规模小、层次低、领域少，发展到多层次全面的沟通，逐步成为彼此间文化交流和合

作机制构建的枢纽。与此同时，人文交流润物细无声，在尊重共建国家文化风俗和根本利益的基础上，有效打开各国民众的人心，为“一带一路”创造良好的社会基础和舆论环境。“一带一路”借助人文交流促进了各种不同文化哺育下的民众相互理解，树立了中国在他国的形象，唤醒了共建国家古文明中的合作意识，推动了合作交流平台的搭建。

（二）

10 年来，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走出一条和平之路、合作共赢之路，“朋友圈”也不断壮大。截至 2023 年 6 月，中国已经同 152 个国家和 32 个国际组织签署 200 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经过 10 年深耕细作，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深入开展了教育、科学、文化、体育、旅游、考古等领域合作，打造了一批“小而美”民生工程，铺就了通民心、达民意、惠民生的阳光大道。推动

共建“一带一路”，既有基础设施的“硬联通”、规则标准的“软联通”，也有共建国家人民的“心联通”。相继落地的农业、医疗、减贫项目，致力于解决共建国家关乎民生福祉的实际问题，以减贫领域为例，中国菌草种植技术已经在 100 多个国家得到推广，为当地创造了数十万个就业机会，契合共建国家减贫发展需求。这些实打实、沉甸甸的成果，有效地提升和改善共建国家民众的生产生活条件，为他们带去了实实在在的幸福感。共建“一带一路”中的人文交流已经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化为现实，从谋篇布局的“大写字”转化为精美细腻的“工笔画”。

在“一带一路”积极践行创立宗旨、为共建国家创造了无限发展机遇的同时，也为共建国家架起了一条人文交往、文化互赏的友谊之桥。10 年来，“一带一路”倡议秉承和而不同、互鉴互惠的理念，尊重“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人民的精神创造和文化传统，与共建国家互办艺术节、电影节、音乐节、文物展、图书展等活动，合作开展图书广播影视精品创作和互译互播。截至 2022 年，丝绸之路国际剧院联盟、博物馆联盟、艺术节联盟、图书馆联盟、美术馆联盟相继成立，已发展成员单位 539 家，覆盖 92 个国家和 2 个国际组织，“鲁班工坊”等 10 余个文化交流和教育合作品牌逐步形成。“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众多，文化资源丰富、种类繁多，拥有超全球一半的文化遗产，加强双方文化交流与合作在丰富中华文化的同时，还促进了文化共荣发展，推动多元文化和谐共生，为人类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食粮。

（三）

10 年来，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广泛开展了多层次、多领域人文交流，推动了文明互鉴和文化融合。未来，要在人文交流的基础上更加主动地通过多方向、多渠道进一步加强沟通、增进共识、凝心聚力、共谋发展，夯实共建“一带一路”民心民意根基，逐步形成多元互动的人文交流大格局。

的贸易顺差，同时要防止本国货币过分贬值引发通胀，并通过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确保通货膨胀率保持在可控范围内。

健全金融监管体制。金融政策滞后、金融信息闭塞、金融监管不当是导致日本资产泡沫危机的重要原因。要在国家各级政府层面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建立与金融环境的变化、经济通胀情况相适应的金融政策动态调整制度。启动金融风险的分级响应预警机制，实现“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充分利用金融科技赋能金融监管，提高识别、监控、处置金融风险的能力。

加大居民金融素养培养力度。投资者盲目跟风，缺乏金融常识和风险控制能力进一步加剧了日本资产泡沫。金融产品的日益复杂化，家庭资产配置选择多元化对金融投资的门槛和专业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国家要启动居民金融素养提升工程，提升公众金融投资决策能力、防范金融风险能力。政府部门要制定提高居民金融素养的政策，将金融素养培养纳入到基础教育、高等教育，通过教育、培训、宣传等方式提高居民金融风险意识、防范金融欺诈、金融产品风险收益的评估能力，扩大金融机构的服务纵深，为社区和乡村提供专业的金融咨询服务，全面提升居民维权意识，畅通维权渠道，增强维权动力。

提振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信心。资产泡沫破灭后，日本居民消费信心不足，储蓄过高，导致内需不足，经济增长停滞。针对投资疲软、内需不足的经济发展状况，国家要制定适当宽松的货币财政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货币信贷总量合理增长。政府主导建立创新型成长企业、国计民生重点行业的扶持计划，引导资金向高新技术行业以及事关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领域配置，恢复内在经济增长动能，提高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信心。

德国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之一。19 世纪 50 年代，德国成立了联邦救援署，承担应急管理教育的任务，主要以战备为目的。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德国于 2004 年建立了公民保护和灾难救援署，应急管理教育的中心任务也随之发生变化，由防卫状态下的民事保护转向灾害状态下的民众保护，应急管理教育转向以人、自然环境、公共设施等为主要内容，并逐渐形成一个组织严密、运行协调的应急管理教育体系。应急管理教育与现代化发展的要求相互促进，为社会安全和稳定提供了重要保障。

构建系统完备的培训体系。德国设立了全面的关于应急事件处理的教育培训部门，按照“决策与执行分离”原则，将其划分为两个独立的培训系统。一是加强对应急事件管理决策人员的培训。以具有领导能力、决策能力、指挥能力和评估能力的政府机关为对象，开展相关的教育培训工作。比如，一些基础设施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新闻发言人、担负着重大救援任务的医生，以及负责保护基层民众的关键部门，他们构成了德国应急管理的行政指挥中心。二是加强对应急事件管理执行人员的培训。他们以从事各种紧急情况下的现场救援工作为主，运用各种专门的救援设备，进行现场的协调、指挥以及各种技术救助工作，组成了德国紧急情况下的战略执行中心。行政指挥与战略执行人员都是由联邦政府内政部的公民保护和灾难救援署以及规划与公民保护学院进行培训。除此之外，一些急救救援志愿组织也有自己专门的紧急救援培训体系和培训课程。各个地方的救援队伍都具有专业的救援设备和技能培训体系，从而可以在各种突发事件发生时，及时、准确地进行灾难救援与保护民众，大大提高救援的效率。

形成专业协同的师资队伍。德国应急管理教育采用专兼结合、以兼为主的师资构成模式，师资力量强且专业素质高。一个现实问题是，无论是在规划与公民保护学院还是联邦技术救援署，专职的教育培训教师数量远远不够，其中大部分是辅助的后勤人员，但学院每年有成百上千的学员，仅靠学院自身的师资力量远远不够，因此外聘了许多拥有丰富学术背景和研究经验的专业教授。他们除能够传授学员相关的专业知识和理论基础之外，还可以组织学术讲座、开展项目研究，为学员提供最新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成果。此外，此种师资队伍模式更要求专业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相结合，所以也聘请了许多参与实际应急管理工作的专业从业者。这些人员可能来自政府机构、救援组织或者私人部门，他们在应急管理领域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实际操作能力。他们通过案例分享、讨论和模拟演习等方式传授给学员实践操作的技能，帮助学员在真实场景中更好地应对各种突发事件。德国的应急管理教育还进行了跨学科合作，聘请了来自其他领域的专家。例如，工程学家分享关于建筑结构和安全设计的知识，医学专家教授学员灾害医学和紧急医疗救援方面的知识，心理学家提供心理支持和创伤干预的技巧。这种跨学科合作的师资构成可以为学员提供多元化的视角和综合性的培训体验。

设置科学合理的培训班次。德国对应急事件处理能力有较高要求，其教育和培训对象主要限于应急管理领域的职业人员。有针对性地开展应急管理教育培训，设定具体的培训内容，可以为科学合理地进行班次的划分奠定基础。在专门的教育培训中，按照学员的知识基础和岗位职责，进行初、中、高的递进式分级培训。每一班次的提升都循序渐进，不能打破。在初级培训班会中，主要学习一些基本的应急

德国是如何开展应急管理教育的

□ 张登国 杨兴慧

管理知识和技能，了解基本的理论框架和基本原则。中级培训班通常深入探讨应急管理的具体领域和专业技能，学员将学习如何应对不同类型的灾害和突发事件，并进一步提升自己应急管理的知识和技能，旨在使他们能够独立应对一般的突发事件。高级培训班主要是由学院与某一联邦部委或某一地方政府的应急管理行政指挥中心共同设计，注重高级理论和实践技能的培训。这些班次通常采用案例研讨、模拟演练等实践活动让学员应对复杂的应急场景，并提供高级技能的培训。不同层级的班次能够满足不同学员的需求，不断提升学员相应的应急管理能力。

突出模拟实践的培训方法。德国的应急管理教育强调操作性、实践性。应急管理教育培训除了基本的课堂讲授、专题研讨、案例分析、学术讲座之外，还拥有广泛的实地演练、情景模拟、桌面推演等培训方法。通过模拟真实情况和场景，培养学员在应急管理工作中的实际操作能力和决策能力。通常情景模拟的演练对培训学员更为有效。情景模拟演练通过设置相对真实的场景，模拟真实的灾害事件或突发情况，例如火灾、地震、化学品泄漏等，给每个学员分配相应的任务并说明承担的职责，让他们在相应的时限之内进行相关的救援工作，由此形成一个完整的应急管理系统，组织、协调各部门的应急响应，锻炼学员的团队合作、指挥和协调能力。模拟演习并非单纯的虚拟，而是完全遵循了真实的政府突发事件处理模式，有对应在应的应急管理行政指挥中心教室，设施装备与现实相差无几。在模拟演习中，演练的过程是正式紧急事件处理的工作流程，预演的情況都是针对各类高风险的灾难场景，可以极大地提升学员实际处置能力。

制定详细标准的培训课程。为保证同类同级的学员能够得到大体一致的培训知识和技能，而不是所有培训学员都接受相同的培训内容，公民保护学院开设了多个不同的教育课程课程体系：一是基础保障课；二是对国内和国际应急事件处理的培训；三是应急事件规划；四是跨州应急管理演练等。在这些课程体系里，也有专门开设的诸如通信技术 with 交通保障、灾害现场的文化遗产保护等专题授课与研讨类课程。联邦救援署的课程与民众保护学院有差别，以技术性营救为目标，培训的最大特色就是对地方救援小组进行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培训。在对志愿者的培训方面，对培训的内容、时间均有明确规定，不得随意增加或减少。培训结束后，还会有一系列考核。德国拥有科学、合理、标准的培训课程体系，使学员能够在不同的突发事件和灾难情景下，接受完整的应急管理教育和培训。

